

師大



學報 No.

15

2022年12月31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戰後初期之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研究
(1945-1949)**

賴冠紋

戰後初期之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研究 (1945-1949) *

賴冠姘**

摘 要

「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乃由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改制而來，臺北高校創立於大正 11 年（1922），為日治時期臺灣唯一一所「舊制高校」，舊制高校的特色在於，學生原則上得以免試直升帝國大學，並具有優於全島的課程、師資以及獨特的「自由自治」校風，該校培育的校友多為日本、臺灣社會各領域中的領導者。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並帶來與日治時期截然不同的學制，民國 34 年（1945）11 月，臺北高校改制為臺北高中，並於民國 35 年（1946）6 月起，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共用同一校地，卻在民國 38 年（1949）7 月決議停辦，與師範學院合併，校地與校產皆歸師範學院所有，就此消失於臺灣人的記憶中。

臺北高中僅於歷史上存在的短短五年時間，正面臨新舊政權的交接之際，隨著新政權而來的新學制、語言與文化，改變了臺北高中的命運。本文旨在研究臺北高中的成立與廢校過程、學制、課程、學風等，期以建構臺北高級中學的全貌，並探討隨著新政權而來的劇烈制度、語言、文化改變，對於臺北高中的影響。

關鍵詞：省立臺北高級中學、臺北高等學校、省立師範學院、中等教育

* 本文改寫自筆者碩士學位論文〈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並於 2022 年 8 月出版《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22）。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品冊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一、前言

民國 107 年（2018）11 月 21 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會議決議，將校史的起點，自原本民國 35 年（1946）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以下簡稱「師範學院」），追溯至大正 11 年（1922）的「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以下簡稱「臺北高校」），¹ 因此，師大校史於今年（民國 111 年〔2022〕），來到意義非凡的 100 週年。然而，在此之前，臺北高校的歷史，不僅未被現存任何一所學校記錄，對於大部分的臺灣人而言，更是鮮為人知。

成立於大正 11 年（1922）的臺北高校，為臺灣唯一一所，由四年尋常科加上三年高等科構成之「舊制高等學校」，其特色為尋常科可直升高等科，而高等科又能直升帝國大學，一試即可直達帝大，因此成為學子們心目中的第一志願，其入學的競爭率，更甚於昭和 3 年（1928）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臺灣大學）。又臺北高校的學風自由奔放，學生可放浪形骸、昂首闊步地在街上放聲高歌，也可自由研習各式課外知識，其威風更可謂當時的天之驕子。該校培育出眾多臺籍菁英，包含前總統李登輝等，在戰後臺灣各領域中發光發熱。

至今，臺北高校雖已作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之前身聞名，但事實上，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北高校後，該校並非立刻為師範學院所繼承，而是先於民國 34 年（1945）11 月 30 日改名「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以下簡稱「臺北高中」），為三年制高級中學。民國 35 年（1946）6 月，師範學院成立於同一校地，並於民國 38 年（1949）7 月，合併臺北高中，臺北高中隨之停辦。雖臺北高中存在時間僅短短五年，但實與臺北高校有直接繼承關係，卻罕為人知。

臺北高中相關研究仍相當有限，最初，僅於蔡錦堂〈日本治台後半期的「奢侈品」——台北高等學校與近代台灣菁英的誕生〉、²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³ 中，說明臺北高校戰後改制情形時，簡略提及。之後，徐聖凱〈臺北高等學校到臺北高級中學的重整延續與斷裂（1945-1949）〉，⁴ 則針對臺

¹ 〈校務會議通過 校史溯自 1922 年臺北高等學校初創〉（2018 年 11 月 27 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996>，2022 年 3 月 29 日瀏覽。

² 蔡錦堂，〈日本治台後半期的「奢侈品」——台北高等學校與近代台灣菁英的誕生〉，收於《2007 年台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外交部，2007），頁 59。

³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233-234。

⁴ 徐聖凱，〈臺北高等學校到臺北高級中學的重整延續與斷裂（1945-1949）〉，收於蔡錦堂主編，《「臺北高等學校創立 90 週年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4），

北高中進行初步的研究與探討，直至民國 109 年（2020），筆者〈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5-1949）〉⁵ 方對臺北高中進行較為全面性的研究與介紹。

此外，在戰後初期學制相關研究中，通常僅提及校名。以臺北高中存在的戰後初期教育界為主題的研究，包含洪瑞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教育的接收與推展（1945-1947）〉⁶ 胡茹涵〈臺灣戰後初期的中學教育（1945-1952 年）〉⁷ 等研究成果。而與臺北高中同時存在的師範學院，則有陳惠珠〈戰後臺灣中等師資之搖籃——臺灣省立師範學院（1946-1955）之研究〉⁸ 說明師範學院創設初期的沿革發展。

本文主要利用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之校史檔案進行研究，本檔案不僅尚無研究使用，且未有正式命名，因此筆者依據其記載內容，將之命名為《臺北高校／臺北高中移交師大檔案》。該檔案記載之內容包含臺北高校移交臺北高中、臺北高中移交師範學院之校地、校產、圖書清冊；臺北高中於戰後初期的招生、編班情形；臺北高中停辦並移交師範學院的相關公文檔案等，得以初步掌握臺北高中前後任的交接情形，以及戰後初期臺北高中的在學生名單。

另外，本文亦使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所藏校史資料，包含《臺北高級中學概況》、《省立臺北高中畢業生成績》、《臺北高級中學第一屆紀念節秩序單》。其中，《臺北高級中學概況》雖未標明作成時間，但因內容與民國 35 年（1946）12 月 7 日刊登於《臺灣新生報》之報導相似，⁹ 或許可推測該文件乃於民國 35 年（1946）年底作成。此批檔案中記載臺北高中的辦學方針、組織系統表、預算表、教職員一覽表、授課時間表，以及學生籍貫、年齡、家庭職業、畢業人數與升學情形統計表等重要資料，有助於臺北高中運作情形與人員構成之研究。

此外，本文尚利用臺北高校與臺北高中的校友會名簿、校友回憶錄與口述訪談等史料。希望藉由上述資料，以補足臺北高校與師範學院之間，過去未曾受到

頁 381-401。

⁵ 賴冠玟，〈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⁶ 洪瑞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教育的接收與推展（1945-194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⁷ 胡茹涵，〈臺灣戰後初期的中學教育（1945-1952 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⁸ 陳惠珠，〈戰後臺灣中等師資之搖籃——臺灣省立師範學院（1946-1955）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⁹ 〈臺北高中 明舉行校慶〉，《臺灣新生報》，1946 年 12 月 7 日，版 4。

矚目的，名為臺北高中的空白歷史；另外，亦期望透過研究存在於戰後初期的臺北高中，了解在新舊政權交接之際，中等教育機構所遭遇的問題及困境，並探討臺北高中在同時期各中等教育機構之間，具有什麼樣的特殊性。

二、從舊制臺北高等學校到新制臺北高級中學

(一) 舊制臺北高校的殞落

臺北高中的前身，為創立於大正 11 年（1922）的「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為七年制的「舊制高等學校」。舊制高等學校乃源於日本的學制，明治 19 年（1886）〈中學校令〉頒布後，最初被稱作「高等中學校」，明治 27 年（1894）〈高等學校令〉公布後，改稱「高等學校」，作為進入大學的預備校，在日本國內逐漸增加。而在殖民地臺灣，大正 11 年（1922）新〈臺灣教育令〉頒布，其中第 8 條規定「（臺灣的）高等普通教育依據中學校令、高等女學校令及高等學校令實施」，¹⁰ 同年 4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規則〉頒布，臺北高校遂據此規則創設。

作為舊制高校的臺北高校，由四年制的尋常科（考試入學）、三年制的高等科構成（入學方式有二，其一為尋常科修畢後直升高等科，其二為中學畢業或修業四年者，透過考試入學），僅招收男性學生，享有日本本土舊制高校的特色與文化。

首先，舊制高校的特徵，即高等科畢業後，原則上可以免試直升帝國大學，具備「帝國大學預科」的性質，當時的日本領土內僅有 38 所舊制高校，臺北高校為其中 10 所七年制高校的其中一所，亦為全臺唯一一所高等學校。若在全臺學生中脫穎而出，通過臺北高校這道窄門，等同事先握有升學大學的入場券，未來的就職之路也同時獲得保障，宛若魚躍龍門一般，搖身一變成為人人稱羨的天之驕子。

而在臺北高校就讀期間，更得以享有優質的師資與教育，¹¹ 以及在殖民地中難得的自由學風，¹² 學生在無升學壓力的情形下，能夠自由探索、廣泛涉獵各式各樣的知識，並在行為舉止、思考表現上，得到政府大限度的自由與寬容。

¹⁰ 加藤春城，《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1939），頁 113。

¹¹ 臺北高校任用之師資，大部分具有大學學歷，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教員，則高達三分之二。著名教師包含圖畫科鹽月桃甫（知名畫家，為臺灣美術展覽會創辦者之一）、英語科葛超智（《被出賣的臺灣》作者）、國語科犬養孝（知名《萬葉集》研究者）等。徐聖凱，〈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48-49。

¹² 學生被鼓勵大量閱讀課外書籍、從事有興趣的活動，例如知名博學者鹿野忠雄（1906-1945），因熱衷於野生考察使得曠課日數高達三分之二以上，校長三澤糾出於惜才之心，仍准其畢業。課外活動方面，學生得以自由經營各式刊物，或於一年一度的臺北高校記念祭中，透過對外公開的教室布置、戲劇表演等方式，自由表達想法，即使大膽批評政府，亦未受校方制止或懲處。

得以通過全臺升學最大難關的臺灣人，在大正 11 年（1922）至昭和 17 年（1942）間，報考尋常科的臺人錄取率僅有 4%，每年錄取人數僅有個位數，而高等科的臺人錄取率亦僅有 11%，¹³ 其入學的競爭率，更甚於昭和 3 年（1928）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臺灣大學）。該校培育出眾多臺籍菁英，包含前總統李登輝、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鐘、立法院院長劉闊才、司法院院長戴炎輝等政治界的領導者，在實業界則有辜振甫、辜寬敏，醫學界則有魏火曜，文學界則有邱永漢、王育德等，對於臺灣社會帶來相當的影響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結束在臺 50 年的殖民統治，由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並著手進行治理與改革。教育機構接收方面，根據民國 34 年（1945）11 月 7 日公布之〈臺灣省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接收處理暫行辦法〉，規定「臺北市區內之州立中等學校，由本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直接派員接收整理」。¹⁴ 民國 34 年（1945）12 月，張金潤前來接收臺北高校，¹⁵ 遂改名為「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¹⁶

除了校名之外，學制亦從日治時期的四年尋常科（類似中學部）、三年高等科（類似高中部），統一改為國民政府規定之「三三制」，乃初級中學與高級中學各三年的制度。¹⁷ 臺北高校改制為臺北高中後，修業年限為三年，僅招收具有中學或中學同等學歷的男性學生，若與臺北高校相比較，與高等科的性質相似，因此本文中論及的臺北高校相關制度、文化等，皆以臺北高校「高等科」為主。

然而，戰後學制的改變，卻使得臺北高校的地位因此一落千丈。根據〈臺灣省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接收處理暫行辦法〉，臺北高校乃作為「州立中等學校」被接收。但是，日治時期的臺北高校，實為屬於「臺灣總督府」的「高等教育」機構，無論在地位、等級、經費上，皆與地方的中等學校相差甚遠，此時卻被當作一般中學處理，導致臺北高校在戰後改制之初，便喪失其原有的地位。

¹³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132。

¹⁴ 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臺北：國史館，1996），頁 355。

¹⁵ 張金潤（生卒年不詳），出身廣東東莞，具有美國紐約大學法律學士，以及西北大學法學博士的學歷，在由行政長官公署發布的〈省立中等學校校長任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3233010001）中，張金潤為眾省立師範學校、中等學校校長人選間，唯一具有博士學歷者，並且列於名單的首位。在戰後時局不穩，且人才嚴重缺乏的情形下，獲派張金潤擔任校長，或許可推測臺北高中在戰後初期，仍受到相當高的尊崇。

¹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概況》（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6），無頁碼。

¹⁷ 戰前採用德式教育體系，由小學至大學修業年限為 6-5-3-3，高等學校屬於大學預備教育；戰後採用美式教育體系，修業年限更改 6-3-3-4。徐聖凱，〈臺北高等學校到臺北高級中學的重整延續與斷裂（1945-1949）〉，頁 391。

接著，民國 35 年（1946）1 月 7 日公布〈臺灣省立各中學及職業學校三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招生辦法〉，第二條規定各中學及職業學校，本學期可招收之新生班次及名額：

甲、省立高級中學

一年級新生一百名；

二年級編級生一百名；

乙、省立各男女中學（專收日籍學生各校不招新生）

設在臺北、臺中、臺南、新竹、高雄五縣者，招收初高中一年級生各兩班。

高中每班五十名；初中每班五十名。

設在臺東、花蓮港、澎湖三縣者，招收高中生一年級一班，初中一年級生二班，高中每班五十名；初中每班五十名。¹⁸

因此，民國 35 年（1946）2 月起，省立各男女中學也得以開始招收高中生，根據民國 35 年（1946）5 月教育部門的施政報告，「本學期招收初高中新生共一百班（已呈報者計九十班，尚有五校未報，每校以二班計算），每班五十名，合計約五千名」。¹⁹ 雖然臺北高中仍保有戰後唯一「高級中學」之名，但已喪失唯一招收高中生學校之實。

不過，臺北高校的特殊之處，並不僅止於其為日治時期唯一一所培育高校生的學校，臺北高校生之所以能成為天之驕子，關鍵原因在於得以免試直升帝國大學，不僅出路受到基本的保障，高校生畢業之後，往往擔任官職、醫師，成為臺灣社會中的菁英階層，更使高校生在學期間，能不受升學考試壓力束縛，得以自由汲取各式各樣的知識，享受自由自治的校風。然而，當臺北高校在戰後被當作一般中學對待的同時，便喪失了直升大學的權利，必須同其他數十所中學，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一起在考場中競爭，使日治時期的高校生成為天之驕子的光環，在政權改制的瞬間，失去原有的光彩。

在戰前即考進臺北高校，但因應戰爭爆發，而被徵召為學徒兵的臺籍高校生（高等科）們，包含昭和 19 年（1944）3 月入學的第 20 屆，以及昭和 20 年（1945）3 月入學的第 21 屆高校生，面對戰後被編入臺北高中，而無法直升大學一事，相

¹⁸ 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頁 367-368。

¹⁹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臺灣省政府向省議會施政報告 教育部門報告彙編》，頁 10。

當不滿。此時，臺大先修班²⁰自民國 34 年（1945）12 月 1 日起，招收中學校畢業，或舊制中學校四年修畢之中華民國國民，該校學生畢業後可直升臺大就讀，²¹ 民報更以「登龍門開了 臺大先修班開始考試」²² 作為標題報導。此外，以往的大學預科生、醫專生、日本在學中的高校生與高專生，也具有編入大學先修班的資格，然而，臺北高校生卻被排除在外。

身為曾經的登龍門，臺北高校生如今更不願坐視專屬於高校的權利，拱手讓人，高校生表達了對於升學問題的惶恐：

高級中學經初級中學三年畢業可以入學之，且高級中學之在學年限三箇年，高級中學與高等學校不相同不過不止年限，而教育內容亦不同，據聞，先修班為大學之直係校，進入大學一定先修班為優先，假使此消息若確實，我等高校生要何處去，祈望高校亦須編入先修班。²³

除了提出想要編入大學先修班的懇切陳情，更可以看出臺北高校生對於編入高級中學的不滿，對高校生而言，新制高中不僅在升學權利上不及舊制高校，入學門檻、修業年限、教育內容等，皆有相當的差異，激起高校生更劇烈的不滿與憤怒。

透過一連串的抗爭，以及對於時任臺大校長的羅宗洛²⁴ 進行密集的陳情，最終使第 20 與 21 屆的高校生，得以在畢業後直接編入臺大。惟第 20 屆高校生，於民國 35 年（1946）3 月，以日本學制的畢業時間畢業，獲頒政權交接前夕（昭和 20 年〔1945〕10 月 24 日），由「臺北高校」所發給的證書；而第 21 屆高校生，則於民國 35 年（1946）7 月，以戰後學制的畢業時間畢業，畢業證書改由「臺北高中」發予。

²⁰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4。臺大先修班前身為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豫（預）科，創立於 1941 年，招收中學畢業生，修業年限三年（同於高等學校高等科），畢業後直接升入臺北帝大就讀。

²¹ 〈國立臺北大學附屬大學先修班（舊大學豫科）招生廣告〉，《臺灣新生報》，1945 年 11 月 28 日，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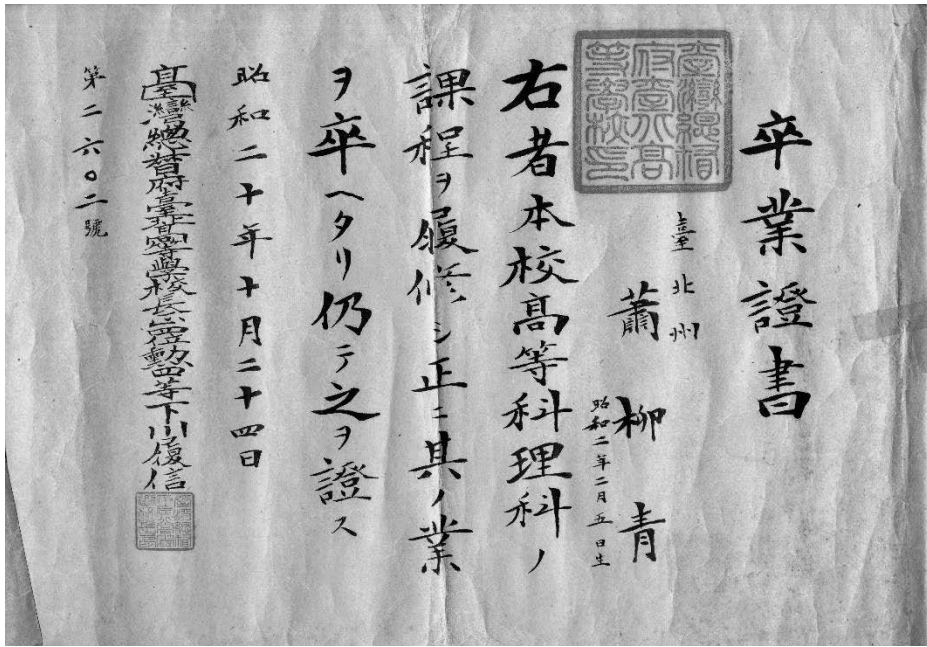
²² 〈登龍門開了，臺大先修班開始考試，教育部羅特派員等監試，投考人員總數一七七四〉，《民報》，1945 年 12 月 24 日，版 2。

²³ 〈反對編入高級中學，高校生開大會〉，《民報》，1945 年 12 月 6 日，版 4。

²⁴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頁 17。1945 年擔任校長的羅宗洛（1898-1978），1917 年畢業於上海南洋中學畢業後，即赴日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仙台第二高等學校，最終畢業於北海道帝國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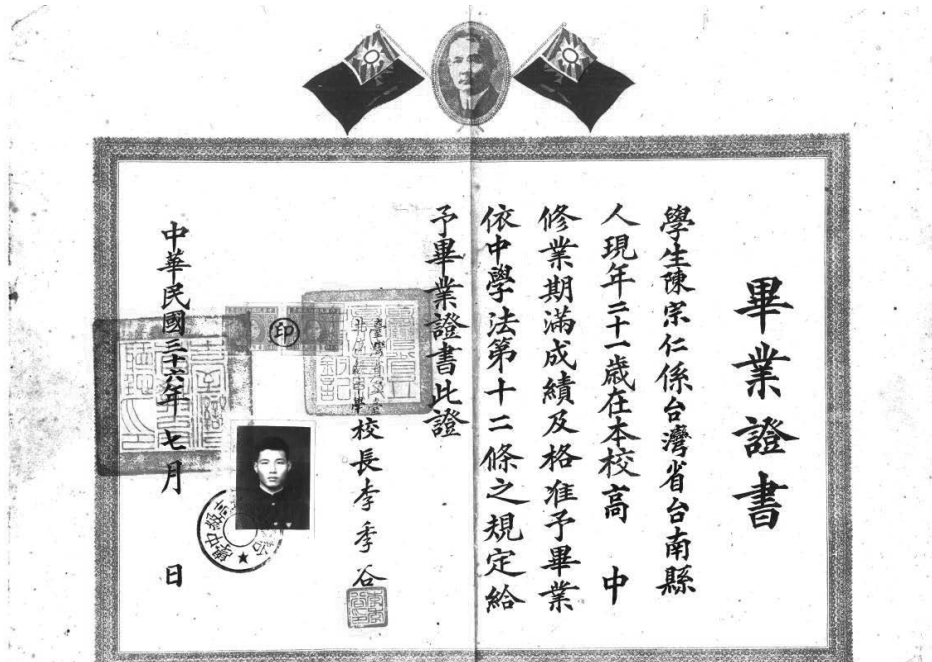
最後兩屆的臺北高校生，在時代交替之間，雖畢業學校並不相同，但皆仍得以免試進入臺大，保有臺北高校生既有的權益。

然而，民國 35 年（1946）2 月，臺北高中開始招收新生，懷著對臺北高校的憧憬，進入臺北高中的學生們，卻成為全臺五千名初高中新生的其中之一，日後需透過競爭激烈的人學考試，才得以升學大學。



圖一 臺北高校卒業證書

資料來源：蕭柳青先生提供。



圖二 臺北高中畢業證書

資料來源：陳宗仁先生提供。

(二) 新制臺北高中的構成

而這些時不我與的臺北高中學生，究竟有多少呢？戰前，臺北高校的學生名冊，即使已在交接時遭到焚毀或佚失，但是，透過臺灣總督府官報、校友會（蕉葉會）的記錄，仍得以被相對詳實、精確地記錄下來。然而，戰後臺北高中的學生名冊，至今僅有部分留存，校方留存的名冊卻又與校友會留存的名冊，有顯著的差異，使得名冊的重建相當不易。以下擬透過現存的校史與校友會資料，針對臺北高中學生的屆數、人數與入學管道，進行研究與討論。

筆者綜合《臺北高校／臺北高中移交師大檔案》中之〈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 三十四年度第二學期在學生名冊（張任移交）〉（以下簡稱〈學生名冊〉），²⁵ 以及臺北高校校友會「蕉葉會」製作的《蕉葉會名簿》²⁶ 中的臺北高中校友名單等資料，進行分析。

然而，經過比對及增補，發現在屆數上，《蕉葉會名簿》中的臺北高中學生僅有「三屆」，然而〈學生名冊〉中卻記錄有「四屆」；而在學生數量上，〈學生名冊〉中的人數，又遠多於《蕉葉會名簿》的記錄，兩者具有相當劇烈的差異。

長期以來，大眾對於臺北高中的了解，大多來自於臺北高校校友會「蕉葉會」的記錄，透過臺北高中校方檔案與相關史料的分析與研究，得以瞭解更符合史實的學生屆數、人數、在學期間、入學方式等資訊。

首先，關於臺北高中在民國 38 年（1949）7 月廢校前，究竟招收了三屆，抑或是四屆學生，關鍵在於前述昭和 20 年（1945）4 月入學臺北高校，民國 35 年（1946）7 月自臺北高中畢業的「第 21 屆臺北高校生」。

昭和 20 年（1945）4 月入學的第 21 屆高等科學生，「入學即入營」，在入學臺北高校的同時，隨即被徵召為學徒兵，因此直到終戰後的 9 月，才真正接受高校的教育，但也僅有短短的半年期間。終戰後，日籍學生遭到遣返，以校友伊藤圭典為例，其於隔年（民國 35 年〔1946 年〕）4 月遣返回國，進入金澤第四高等學校繼續完成學業。²⁷ 而臺籍學生則編入「新制」臺北高中，成為臺北高中的第一屆學生。

²⁵ 〈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 三十四年度第二學期在學生名冊（張任移交）〉，《臺北高校／臺北高中移交師大檔案》，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無檔號。「張任移交」指臺北高中第一任校長張金潤，其於 1946 年 7 月以「體弱多病」為由請辭，因此將其任內截至三十四年度第二學期的在學生名冊，移交予次任校長。

²⁶ 蕉葉會，《蕉葉會名簿（2005～2009 年版）》（東京：蕉葉會，2004），頁 115-128。

²⁷ 蔡錦堂、津田勤子訪問，田中美帆記錄，伊藤圭典口述，2018 年 8 月 21 日。

對照〈學生名冊〉，臺北高校第 21 屆共 64 位臺籍學生，依照原本的文科、理科編班，編入臺北高中三年級，並於戰後學制規定的畢業時間，「(民國 35 年[1946]) 七月又按新制舉行畢業考試一次，計畢業學生六十四人」，²⁸ 獲頒臺北高中發給之畢業證書，成為臺北高中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第 21 屆臺籍學生，仍享有舊制高等學校直升帝國大學的權利，全員亦得以免試進入臺灣大學就讀。

這批學生，被臺北高中〈學生名冊〉歸為「第一屆」的學生，於《蕉葉會名簿》中則歸屬臺北高校第 21 屆，不計入臺北高中，但若以這批學生所持的畢業證書為準，應為「臺北高中第一屆學生」無誤。因此，事實上，在臺北高中廢校前，其學生應共有四屆。

第二屆起，臺北高中始對外進行招生，民國 35 年 (1946) 2 月 7 日，《臺灣新生報》同時刊登兩則廣告，分別為〈臺高同窓會員に告ぐ〉(向臺高同學會員公告) 以及〈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即前臺北高等學校) 招生公告〉。

The image shows two side-by-side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The left advertisement is titled "臺高同窓會員に告ぐ" (Notice to Former Students of Taiyuan High School) and contains text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The right advertisement is titled "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即前臺北高等學校) 招生公告" (Recruitment Notice of the Provincial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and lists details about the school's admission process, including exam dates, subject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school principal, Zhang Jinjun.

圖三 1946 年 2 月 7 日《臺灣新生報》兩則頭版廣告

資料來源：〈臺高同窓會員に告ぐ〉、〈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即前臺北高等學校) 招生公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2 月 7 日，版 1。

〈臺高同窓會員に告ぐ〉如此寫道：「在我們的母校臺高，已然消失的此時，為了將來的聯繫方便，欲彙編所有會員的資訊，以製作新名簿」，並告知臺北高校的校友們，將個人資料寄送至「臺北市古亭町(省立臺北高級中學內)臺北高等學校同窓會」。²⁹

²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概況》，無頁碼。

²⁹ 〈臺高同窓會員に告ぐ〉，《臺灣新生報》，1946 年 2 月 7 日，版 1。

就在臺北高校「已然消失的此時」，新制臺北高中展開第一次招生，招收高中一、二年級新生各一百名，投考資格如下：

投考高中一年級須曾在舊制中學修滿三年者

投考高中二年級須曾在舊制中學四年畢業或五年制修滿四年或具有同等學力者。³⁰

34 學年度第 2 學期（民國 35 年〔1946〕2 月至 7 月）結束後，一、二年級學生順利升上二、三年級，遂於民國 35 年（1946）10 月開始進行第二次新生招考，招收一年級新生 20 名，凡在本省舊制中學修業滿三年者或國內初級中學畢業者均可投考。³¹

此次為臺北高中舉行的第二次入學考試，亦是最後一次入學考試，民國 35 年（1946）6 月，師範學院為解決戰後初期師資不足的問題，成立於臺北高中校內，並於民國 38 年（1949）7 月，取代臺北高中。因此，民國 35 年（1946）10 月入學的高中一年級新生，在民國 38 年（1949）7 月畢業的同時，成為臺北高中最後一屆畢業生。

除了考試入學的管道外，尚有針對自日本返臺、自中國來臺學生的兩種登記分發方式。

民國 35 年（1946）初，針對戰前在日本留學的臺灣學生，教育處遂依照〈臺灣省留日返省學生處理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辦理留日返省學生登記及編級試驗辦法〉³² 分別於民國 35 年（1946）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舉行第一期登記分發，5 月 1 日至 6 月底舉行第二期登記分發，經過留日返省學生審查委員會審查，將學生依照其學歷及志願，分發至相對應的學校。

透過當時的留日返省學生登記分發統計資料，可以觀察到，分發至臺北高中的人數，遠多於其他中學。³³ 分發乃參考學生的個人志願，或許可以推測，在此

³⁰ 〈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即前臺北高等學校）招生公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2 月 7 日，版 1；2 月 8 日，版 2；2 月 9 日，版 2；2 月 10 日，版 2；2 月 12 日，版 1；2 月 13 日，版 1；2 月 15 日，版 1；2 月 16 日，版 1。自 2 月 13 日起，報名截止日由 2 月 15 日改為 2 月 17 日。

³¹ 〈省立臺北高級中學招生廣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10 月 9 日，版 3；10 月 10 日，版 4；10 月 11 日，版 2。

³²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臺灣省教育概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6），頁 127-128。

³³ 第一期分發至臺北高中人數為 21 名、第二期為 33 名，其他中學大部分為個位數，數量多者亦僅有十數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臺灣省教育概況》，頁 125-126。〈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公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7 月 14 日，版 1。

時的臺灣中學生心目中，臺北高中仍然等同於日治時期培育社會菁英的臺北高校，依然是臺灣高中的第一志願。

《臺北高校／臺北高中移交師大檔案》中，藏有〈台灣省留日返省學生第二期登記分發台北高中名冊〉，³⁴ 其中記錄每位學生的「畢業年限」，並以此作為編入年級的依據，畢業年限為 4 年者，表示該生於日本的中學修業 4 年，應編入高中二年級，畢業年限為 5 年者，則編入高中三年級。此乃學制轉換的配合措施，以中華民國學制的「三三制」為基礎，將於日本中學修業的時間代入，以決定留日返省的學生編入戰後臺灣高中的年級。最後經過入學編級試驗，留日返省學生乃於民國 35 年（1946）9 月入學，成為 35 學年度第 1 學期的新生。

除了自日本返回臺灣的學生，隨著新政權而從中國來到臺灣者，則依循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於民國 35 年（1946）8 月 16 日公告之〈內地來臺公教人員子女申請轉入本省中學肄業登記辦法〉，³⁵ 獲得編入臺灣學校的機會。「內地來臺」指自中國來臺者，對象為已於公私立初級中學畢業，或者公私立中學高初級肄業者，將之分發至臺灣各區中學。申請者須填具相關申請文件，經審查後分發，再至各校參加編級試驗，並特別強調「經分發入省立中學肄業，得與各校原有學生享受同等待遇」。

總而言之，臺北高中存在的昭和 20 年（1945）至民國 38 年（1949）期間，共有四屆學生，首屆學生為昭和 20 年（1945）4 月，進入臺北高校第 21 屆的臺籍學生。第二、三屆學生為臺北高中公開招生的第一批新生，通過民國 35 年（1946）2 月舉行的招生考試，於民國 35 年（1946）3 月展開第一學期的課程。除了考試外，自日本返回臺灣的留學生、從中國前來臺灣的中學生，得依照其戰前學歷及志願，申請登記分發，通過學校舉辦的編級試驗後，便可於民國 35 年（1946）9 月，成為臺北高中的新生或插班生。

民國 35 年（1946）6 月，師範學院於臺北高中校地成立，並於民國 38 年（1949）7 月取代臺北高中，使民國 38 年（1949）7 月自臺北高中畢業之高三學生，成為該校第四屆，也是最後一屆學生，而這屆學生乃於民國 35 年（1946）10 月通過招生考試入學者，再加上部分來自日本或中國，透過登記分發編入一年級者。

³⁴ 〈台灣省留日返省學生第二期登記分發台北高中名冊〉，《臺北高校／臺北高中移交師大檔案》，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無檔號。

³⁵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內地來臺公教人員子女申請轉入本省中學肄業登記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5：秋：41（1946 年 8 月 16 日），頁 645-646。〈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公告〉，《臺灣新生報》，1946 年 8 月 17 日，版 1。

各屆學生的人數，筆者以〈學生名冊〉為基礎作成學生名單，接著再與《蕉葉會名簿》相對照，進行名單的增補後計算而出，第一屆學生共有 64 名、第二屆學生約有 164 名、第三屆學生約有 247 名、第四屆學生約有 32 名，總計約為 507 名。³⁶

其中，臺北高中校方〈學生名冊〉中的人數，遠多於《蕉葉會名簿》的記錄，筆者推測或許是《蕉葉會名簿》中記錄者為最終成功畢業者，故再對照《省立台北高中畢業生成績》，³⁷ 發現《蕉葉會名簿》大部分確實為成功自臺北高中畢業的學生。

另外，令人好奇的是，各屆在學人數扣除插班編入的留日返省學生後，仍遠超過該屆考試入學的預定招生人數（第二、三屆原預定各招 100 人，第四屆預定招收 20 人），第三屆更是比預期多收 100 名以上，或許可以推測，除了本文介紹的招生管道之外，尚有其他入學管道，待日後其餘相關史料出現，再行探討。

無論透過何種方式進入臺北高中，剛從二次大戰的戰火中劫後餘生的少年們，懷著對於臺北高校的憧憬，報考改制後的臺北高中。然而，臺北高中是否如他們所期待的一般，仍具有戰前的規格與水準呢？以下透過比較臺北高校與臺北高中的課程、師資與校風，以進行分析與討論。

三、新舊政權間的臺北高中：課程、師資與校風的轉變

（一）課程與教學品質

日治時期的臺北高校，具有「大學預備教育」與「高等普通教育」兩種性質，「大學預備教育」目的在於，使未來幾乎所有人皆會升學大學的高校生，習得進入大學後所須的基礎學力，在課程安排上相當重視外語訓練；「高等普通教育」目的在於廣泛教授各領域的基本知識。此外，重視培養學生的研究、賞析能力或興趣，學生的學習不僅限於課內，在課外自主閱讀各式各樣領域的書籍、自主研究感興趣的事物，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因此，高校教育一般被視為通才教育或通識教育。

³⁶ 各屆學生名單，以及學生人數計算過程，請參考賴冠奴〈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5-1949）〉附錄四：臺北高級中學學生名冊。

³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省立台北高中畢業生成績》（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出版年不詳），無頁碼。

臺北高校高等科依照學生的主修科目，分為文科、理科，文科以人文類學科為主修，理科以數理類學科為主修，再依照主修外語，分為甲類、乙類，甲類以英語為第一外語、德語為第二外語，乙類以德語為第一外語、英語為第二外語。根據上述分班規則，高等科一個年級各有文甲、文乙、理甲、理乙，四個班級。

儘管主修科目不同，文科與理科課程安排的共通點，為對於外國語及人文類學科的重視，主修科目與外國語科目的時數總和，即佔授課總時數的八成左右，這也是臺北高校高等科課程的特色。³⁸

戰後，繼承臺北高校高等科的臺北高中，在教學重點、課程安排上，是否同樣承繼自臺北高校呢？

師大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概況》中〈三月來之校務概況〉，說明校方的教學方針：

第三，教學方面則除仍保留高等學校時代數理較高之水準外，並特別注意國語及本國史地知識之講授，迄今已舉行國語演說競賽兩次……學制更動期中，本校因情形特殊，課程不相銜接之處甚多，為顧全學生之學業，除遵照教育處規定外，更酌增課程以便學生之選習與補習……。³⁹

再進一步比較民國 35 年（1946）6 月，由教育處頒布之〈高級中學教學科目及各學期每週各科教學時數〉，⁴⁰ 與師大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概況》中〈省立臺北高級中學三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科目及每週授課時間表〉，綜觀臺北高中的課程安排、授課時數，可以看出其教學重點。時數佔比最高者為「保留高等學校時代水準」之數理科目，其次為政府重視的國語及本國史地知識。此外，若將英語課加上補充課程的德語課，外國語授課時數亦不亞於上述科目。

³⁸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154。

³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概況》，無頁碼。

⁴⁰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臺灣一年來之教育》（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頁 64-66。

表一 三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臺北高中課程分類與平均每週授課時數

	第三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一學年	
	文組		理組		文組		理組		不分組	
	時數	百分比	時數	百分比	時數	百分比	時數	百分比	時數	百分比
國語	9	25.7%	7	17.9%	10	27.0%	8	21.6%	11	35.5%
外國語	9	25.7%	8	20.5%	8	21.6%	7	18.9%	5	16.1%
人文類	5	14.3%	5	12.8%	5	13.5%	5	13.5%	5	16.1%
數理類	10	28.6%	17	43.6%	11	29.7%	14	37.8%	7	22.6%
音樂	0	0.0%	0	0.0%	1	2.7%	1	2.7%	1	3.2%
體育	2	5.7%	2	5.1%	2	5.4%	2	5.4%	2	6.5%
總計	35	100%	39	100%	37	100%	37	100%	31	100%

1. 外國語包含英語、德語。
2. 人文類包含公民、歷史、地理。
3. 數理類包含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礦物。

資料來源：〈省立臺北高級中學三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教學科目及每週授課時間表〉，收錄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概況》，無頁碼。

此外，因「本校因情形特殊，課程不相銜接之處甚多」，臺北高中又提供部分課程，供學生選修，選修科目以數理類學科、德語為主。

其中，德語為日治時期臺北高校以來的特色課程，無論文科、理科皆為必修的外語課程，然而，根據校友的回憶，⁴¹ 僅有第二、三屆校友（35 學年度第 1 學期時，分別為三年級、二年級生）曾上過半年的德語課程，第四屆校友在高中三年間，從未上過德語課。或許是因為此時教授德語的教師，為日籍留用教師石本岩根，35 學年度第 1 學期（民國 35 年〔1946〕8 月至民國 36 年〔1947〕1 月）仍留用在校，得以替二、三年級學生上課。隔年（民國 36 年〔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留用日人被懷疑指揮暴動、動搖政權，在民國 36 年〔1947〕4 月中旬至 5 月 3 日，全數遣返日本，德語課因此僅維持了短短一個學期。

比較臺北高中與臺北高校的課程，雖然臺北高中宣稱「仍保留高等學校時代數理較高之水準」，數理科的授課時數亦為最高，但臺北高校最具特色，且授課時數最多者，實為外國語以及人文類學科。臺北高中時期，人文類學科僅剩下「本國史地知識」，缺乏臺北高校時期，培養學生思考的哲學概論、論理（邏輯學）等

⁴¹ 蔡錦堂訪問，賴冠奴記錄，陳宗仁口述，2018 年 9 月 16 日。蔡錦堂訪問，賴冠奴記錄，溫理仁口述，2019 年 3 月 7 日。

科目，時數也較低；外國語學科，雖然不及高校時期的授課時數，仍有相當的授課時數，且仍保持具有臺北高校特色的德語課，然而，因為日籍德語教師的遣返，導致外國語時數驟減，再加上政府大力推廣國語（中文），使得國語時數凌駕於外國語之上。

其中，隨著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國語（中文）」乃為國民政府所帶來全新的制度與文化中，對於臺灣人民造成最為巨大的改變者，徹底顛覆了當時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國語」作為嶄新的學科，以及授課的媒介，更對當時包含臺北高中在內的教育機構，帶來了劇烈的影響。

針對中等學校的國語教育，民國 35 年（1946）起，由教育處向中國甄選合格的中等學校教員；然而，為了應付國語推廣的燃眉之急，「由內地〔按：中國〕來臺的教員，雖不一定是擔任國語教學的，可是，如果他們的國語說得『差不多』，那就也要他們『勉為其難』了」，⁴² 可見接收初期，負責國語教學的教員，多為急就章的緊急支援人力，師資來源混雜，且僅接受短期訓練，提供的教學品質難以保證。

戰後初期，臺北高中的國語、國文教師，同樣多數來自中國，根據《臺北高級中學概況》中收錄之〈教職員一覽表〉，國語、國文教師共有 5 名，其中有 4 名來自中國，臺籍教師僅有兼任訓導主任的陳蔡煉昌。⁴³ 從臺北高中第一屆校友呂耀樞的回憶中，可以觀察到學生們學習國語的情形：

當時我們沒有好好地唸，剛開始的時候很用心，老師都是教注音符號，注音符號我覺得可以用就好了，但他一直訓練注音符號，好像我們是國小的孩子一樣，所以對國語雖然開始的時候有很想要學，但每天都在演練注音符號，沒有很想要學，我就沒有興趣了，後來國語的時間就不去了，想說可以唸一點小說什麼就好了，以前的高中的學生都在演練注音符號。⁴⁴

⁴² 何容、齊鐵根、王炬編著，《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臺灣書店，1948），頁 29。

⁴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概況》，無頁碼。詳細教職員一覽表，請參考賴冠奴〈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5-1949）〉，頁 84-86。

⁴⁴ 蔡錦堂、徐聖凱訪問，呂耀樞口述，2008 年 5 月 6 日。徐聖凱，〈臺北高等學校到臺北高級中學的重整延續與斷裂（1945-1949）〉，頁 398。

臺北高中第二屆校友陳宗仁則回憶道：

那時候大家都還用日本話在講話，從中國來的老師也知道我們聽不懂，就慢慢地溝通……可以說老師教是教，但我們還是自己讀，自己幫ㄅㄆㄇ注音，我們看得懂漢字的意思，但是沒辦法發音，所以不用老師解釋，老師只要教發音，「ㄅㄆㄇ」、「我去學校」……慢慢自己學，大部分都是自己自修。老師是有國語那樣的課，但我們還是自己看書、翻書。⁴⁵

從校友的回憶中可以看出，老師能教授、協助的部分，因為語言的障礙，僅能提供注音符號的演練，或是讀音的示範，無法教授更進一步的知識，使得國語課形同自修課，學生學習的效率不佳，甚至不願意去上課，日後在國語的實用上，仍有相當的困難。語言的轉換，並非一蹴可幾，此時尚有部分日籍教師留用臺北高中，亦有臺籍教師，在能夠使用日語的日籍、臺籍老師授課時，則多使用日語授課。

透過臺北高中的課程安排，僅能了解各科的時數比重，難以了解實際的上課情形、教學品質，其中，教員的素質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根據上述《臺北高級中學概況》中的〈教職員一覽〉，以及校友會編纂名簿中的「師長通訊錄」，歸納出戰後臺北高中的教員（不含職員），共有 36 名，教員中有 30 名男性、3 名女性、3 名不明。⁴⁶

觀察其籍貫與國籍，36 名教員中，22 名為外省籍（61%）、7 名為臺籍（19%）、6 名為日籍（17%）、1 名不明（3%），在教師的聘用上，可見外省籍的師資為壓倒性的多數。觀察其學歷，具有大學學歷者 14 名，具有專科學校、師範學校學歷者 4 名，雖然學歷不明但之後續任大學教授者 3 名，在 36 名教員中，具有高等學歷者佔半數以上。

其中，較為知名的臺籍教師，為同時兼任訓導主任的國語教師——陳蔡煉昌（1912-2007），出生於臺中豐原，畢業於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之後更曾前往北京學習，因此能講臺語、日語，更講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甚至優於其他外省人。⁴⁷其於師範學院草創時期，便兼任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並參與各項校務重大決定，臺北高中停辦後，仍續任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直至退休。

⁴⁵ 蔡錦堂訪問，賴冠奴記錄，陳宗仁口述，2018 年 9 月 16 日。

⁴⁶ 同註 43。

⁴⁷ 林曙光，〈一逢永訣呂赫若〉，《文學臺灣》6（1993 年 4 月），頁 19。

外省籍教師部分，則有有擔任校務主任的宗亮東(1911-1996)，江蘇宜興人，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教育系、中央大學教育研究所，來臺前曾任職於數所師範學校，來臺後，除任臺北高中校務主任，同時擔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副教授，後又兼任臺灣省立和平中學校長、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校長等職，赴美留學後，出任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及改制後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共 19 年。⁴⁸

日籍教師則是為了確保臺灣在戰後仍能持續運作，部分依據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臺灣省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接收處理暫行辦法〉而獲得「留用」者，包含教授物理的內藤昌平、教授化學的佐伯秀章(畢業於北海道帝國大學)、教授生物的松本邦夫(原任於臺北高校，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數學的市原哲治(原任於臺北高校，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太田賴常(原任於臺北高校，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與末岡勝馬，以及原為德語教師的圖書館主任石本岩根(原任於臺北高校，畢業於九州帝國大學)。

雖然日籍留用師資，皆於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後遭到遣返，但是，這些優秀的日籍理科教師，在師資缺乏的戰後初期，仍能提供臺北高中的學生們優質的理科教育。此外，留用的日籍職員中，尚包含教授德語的石本岩根，因此臺北高校獨具特色的德語課，雖然已無法維持如戰前一般的重要地位，但仍能使臺北高校的特色，短暫延續至戰後。

無論是留用之日籍教師，或於戰後聘任之外省籍、臺籍教師，臺北高中的教師多為具有高學歷者，在戰後初期中等學校師資嚴重缺乏的情形下，提供優於當時全島中等學校的教學。

即使如此，和日治時期臺北高校相比，臺北高校的師資，絕大部分為接受高等教育者，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教員，甚至高達三分之二，具有高等學歷的教員，壓倒性地多於臺北高中，兩校之間仍有難以彌補的差距。

臺北高中雖承繼自臺北高校，但在授課目標上，未能完整繼承臺北高校重視人文學科的精神，反而以數理學科，以及配合政策實施的「本國史地知識」為主。不過，外國語部分仍承繼了臺北高校的特色與精神，雖然受到時代背景與變遷的影響，難以維持外國語學科之品質與時數，但仍短暫保留臺北高校的特色學科——德語，加上英語後，也尚有相當的授課時數。在教學、師資品質上，雖然已優於同時期的其他學校，但仍與臺北高校時期有相當的差距。

⁴⁸ 中華民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 詞條名稱：宗亮東」，<http://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5%AE%97%E4%BA%AE%E6%9D%B1>。

在此，可以觀察到臺北高中存在於兩個政權的夾縫之間，同時具有舊政權與新政權特色，亦是時代變遷的見證。

(二) 校風與校園生活

日治時期，臺北高校作為日本領土內的舊制高等學校之一，自然受到日本本土高校的影響，日本各高校傳統的「自由自治」精神，也在臺北高校紮根。自由顯現在學生的知識獲取、思想與表達，得以自由閱讀課外讀物、進行文藝創作及刊物編纂，並衍生出「蔽衣破帽、ストーム（storm，指一群學生，於公共場所高聲唱歌、跳舞）、コンパ（指聯誼活動）、長髮、蓬髮、寮雨、寮歌、萬年床」等獨具特色的行為；⁴⁹ 自治則呈現於學生宿舍的完全自治。自由自治的學風在相對壓抑的殖民地，仍然熠熠生輝，至今仍為校友津津樂道。

戰後的臺北高校為臺北高中繼承，過去學生引以為傲的「自由自治」精神，是否也同樣被繼承了呢？

師大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概況》中說明校方的訓導方針：

訓導方面，本校訓導方針在於培育學生人格啟發其自動自治之精神，故對宿舍教室之秩序皆責成學生自行維持……最近學生自治會且成立各種團體，推行學術研習及體育之活動。此次校慶紀念日遊藝會之準備均由學生主持。⁵⁰

其中，校風定位為「自動自治」、「誠樸勇勤」，雖仍強調學生在課堂、宿舍的自治，但是原本高校生引以為傲的「自由」，此時則改為「自動」，臺北高中學生們的校園生活實況，究竟是如何呢？

根據校友的口述，以制服為例，過去，臺北高校的「自由」，最為外顯、具體的形象，便是「下課後，經常三三五五，意氣昂揚地，挽臂橫行於顯眼的榮町一本町通，著蔽衣破帽、高腳木屐，高唱デカンショ與校歌，唯我獨尊而橫行闊步的樣子」，⁵¹ 身著蔽衣破帽，肩披黑斗篷，腰垂長毛巾，腳踏高腳木屐的模樣，即是臺北高校生的正字標記。

⁴⁹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78。

⁵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概況》，無頁碼。

⁵¹ デカンショ中，デ是Descartes，カン是Kant，ショ是Schopenhauer，乃笛卡爾、康德、叔本華三位德國哲學家姓名之縮寫。徐聖凱，〈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頁 71、129。

戰後，臺北高中並未規定制服，上學可以自由穿著，然而，臺北高中生們仍然喜歡穿著臺北高校時期的舊制服，腳踩木屐，與同學們三五成群地上街閒逛，第四屆校友溫理仁，則特意模仿同鄉臺高前輩的穿著：

回想起來，我在學的時候雖然流行「蠻風〔按：バンカラ，日本舊制高校中流行的風格，穿著弊衣破帽，行為粗暴野蠻〕」，但我穿著皮鞋以及整齊的衣服，因此被同學稱為「松山（臺北市東側的市街）的紳士」。以前我時常在松山車站看到同鄉的吳建堂前輩〔按：臺北高校第18屆〕，他戴著沒有破損的臺高帽，以及整齊的灰色制服，僅有書包用草繩掛著，在腰間繫上長毛巾，穿著日式的高木屐。我當時便選擇模仿吳前輩，戴著臺高帽，穿著制服，在腰間垂掛長長的毛巾，並踏著臺灣木屐上學。⁵²

其中，最受臺北高中生歡迎的便是縫有兩條白線，並且別著臺北高校校徽，被視為高校生象徵的白線帽。值得注意的是，臺北高中生仍以臺北高校的校徽作為自己的校徽，並以此為榮，因此，部分學生會購買別有校徽的臺高學生帽配戴。而買不到的學生，如第四屆校友溫理仁，則不惜親手製作一頂，自己畫上兩條白線，以及臺北高校的校徽。⁵³ 畢業幾十年後，溫理仁仍然會戴著親手製作的臺高學生帽，參加臺北高校同學會，對溫理仁而言，「相較於臺灣大學、美國的研究所，曾經於臺北高校就學，才是最棒的榮耀」。⁵⁴

對臺北高中生而言，儘管校名已經不同，但他們仍認同自己為臺北高校生，並且以此為榮，雖然難以完全相同，仍盡其所能在外表、行為上，仿效臺北高校生。

除了在外表上展現「自由」，臺北高校「自由」的內涵，更包含自由地獲取感興趣的知識，自由地思考並且表達。

在自由地獲取知識方面，臺北高中第二屆校友陳宗仁回憶其學寮生活：

讀書的時候有自由活動，學校都不管，都是學寮來舉辦活動，郊遊、休閒活動、棒球、請老師來吃飯和演講，都是學生自己做，學校都不管。⁵⁵

⁵² 溫理仁，〈台北高等学校創立九十周年紀念大会〉，《我輩は犬である》（作者自印，2015），頁240。

⁵³ 蔡錦堂訪問，賴冠姣記錄，溫理仁口述，2019年3月7日。

⁵⁴ 溫理仁，〈台北高校同窓会の三水会〉，《我輩は犬である》，頁37。

⁵⁵ 蔡錦堂訪問，賴冠姣記錄，陳宗仁口述，2018年9月16日。

其中，在課餘時間邀請老師來演講，即是汲取課外知識的管道之一，臺北高校時期，亦有在課餘時間由教授主持的讀書會等活動。此外，臺北高校的大量藏書，仍然供臺北高中的學生使用，甚至七星寮內也附設圖書室，以及唱片室，供寮生們使用，⁵⁶ 因此，臺北高中的學生仍享有豐富的資源。

在自由思考與表達方面，臺北高校生在一年一度的臺北高校紀念祭中，學生可以透過自行布置班級教室、自編自演「紀念祭劇」等方式，向來校參觀的一般民眾表達自己的想法，甚至展現與政府立場相左的想法，或以極其嘲諷的方式批評執政當局，仍未受到校方制止或懲處。

在戰後初期，臺北高中學生在紀念祭的舉辦上，仍然擁有相當的自主權。戰後，紀念祭改稱「校慶紀念日遊藝會」、「紀念節」，臺北高中第一屆「紀念節」，從統籌到宣傳、販賣，皆由學生一手包辦。

紀念節的劇本使用中國、德國、日本、英國、美國的著名劇本或小說，或許可以推測臺北高中生，對世界各國的名著皆有涉獵，仍延續臺北高校時期，鼓勵閱讀課外讀物的風氣。

而劇本以臺語、德語、日語、英語、國語演出，演唱的曲目中也有德語、義大利語歌曲，一方面展現臺北高中在英語、德語等外語上的優異表現，尤其德語更是沿襲自臺北高校的特殊外語科目。另一方面，此時以國語演出是理所當然，但是不被政府鼓勵的臺語、日語在紀念節劇中，仍佔有相當的份量（7 部劇碼中，共有 2 部臺語劇、2 部日語劇），或許是戰後初期政府並沒有嚴格限制，也可能代表著臺北高中學生表達的自由。

⁵⁶ 蔡錦堂訪問，賴冠姣記錄，蕭柳青口述，2019 年 3 月 21 日。

**省立臺北高級中學
首屆校慶紀念日遊藝會**

日時：十二月八日 上午十時起
地址：龍安街(舊高等學校)

歡迎各界
光臨指教

(1) 音樂
獨奏 合唱 etc

(2) 演劇
Faust
The Monkeys Paw
白衣人 etc.

(3) 裝飾展覽
PAMOBAMA

另有食堂設備
食券前售並附呈
招待券

食券(附呈招待券) 前售處
前售處 新中山公園口 中光號
延平路一段 榮安攝影社
本校宿舍

圖四 省立臺北高級中學首屆校慶紀念日遊藝會 廣告

資料來源：〈省立臺北高級中學首屆校慶紀念日遊藝會〉，《臺灣新生報》，1946年12月5日，版1。



圖五 臺北高中第一屆紀念節 秩序單封面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第一屆紀念節秩序單》。

PROGRAM (秩序單)			
第 一 部			
1	唱 校 歌		
2	劇 一隻馬蜂 (台)一幕(原作)西 林……林 師 模等		
3	Clarinet 獨奏 Traumerl. Schumann 潘 英 章		
4	劇 Tausl (德)一幕 Goethe 陳 成 章等		
5	第 一 合 唱 指 揮 者 黃 國 豐 邱 仕 豐等		
	(1) Die. Ehre. Gottes. Ausir. Notur.		
	(2) When jtb sPring time in the rockies (英) (外一曲)		
6	Piano 銀 波 陳 維 冬		
第 二 部			
7	口 琴 Donau wellen 蔡 惠 風 Red Rose Waltz Seranad e-Drigo		
8	Violin 荒城之月 林 建 中		
9	劇 現代金色夜叉 (日)三幕 賴 文 傑等		
—(1)—			
10	Piano 乙女祈禱 蔡 惠 風		
11	歌 劇 別離之曲 (日)三幕 黃 共 輝等		
12	獨 唱 Osoie mio (伊) E. caPua 廖 上 達 Standchen (德) Schubevt 吳 清 松		
13	劇 The Monhey Paw (英)一幕 w. w. jacobs 張 榮 宗等		
14	(第二)合唱 有土地伊之光勝日午 指 揮 者 黃 共 輝 歡喜聚集 (日) 台高 Y. M. O. A. Nearver mygod to Thee (英) 吳 道 明等 同		
15	喜 劇 巨人侏儒 (台) 顏 凱 雲等		
16	Piano Inuitation to walz 丁 守 真		
17	劇 白衣人 (White in meh)(國)三幕 陳 財 等		
18	獨 唱 Lorelei (德) F. ci lcher 邱 仕 豐 Torna a Surriento(伊) Curtis 同 Santa Lucia (伊) Italian.foloksongs 蘇 遠 志		
19	Piano 月 光 曲 Beethoven 林 建 中		
20	舞 踏 台高舞		
—(2)—			

圖六 臺北高中第一屆紀念節 秩序單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臺北高級中學第一屆紀念節秩序單》。

除了透過紀念祭等體制內的方式表達想法，臺北高校乃至日本內地的舊制高校，面對危害學生權益，尤其干涉高校生的自由、自治權的威脅，更會採取「罷課」的手段。

臺北高校時期，曾發生過兩次罷課事件。首次為發生於昭和 2 年（1927）的「生徒監事件」，生徒監為臺北高校學生宿舍「七星寮」中的監督者，學生不滿生徒監的管理過度嚴格，向校長要求處分生徒監。⁵⁷ 第二次罷課事件，則發生於昭和 5 年（1930），起因為某生於德語測驗中私下翻書，而遭校方退學；又有一名學生，以筆名而非真實姓名，在校內販賣部購買菸草，被誤為詐騙而遭退學。學生認為校方未徹查事實，便嚴懲學生的作法失當，且對部分教師不滿，故發起抗爭。⁵⁸

⁵⁷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94-96、103。

⁵⁸ 同註 57，頁 99-103。

在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甫接收臺灣，各領域與機構的制度與法規都尚未穩定，其中，教育制度尤其是如此。在數個月前，仍為全臺唯一一所高等學校，且具有大學預科性質的臺北高中，在戰後的學制改革中，便成為受到最大衝擊者，臺北高中的學生，就如同數十年前臺北高校的前輩一般，同樣進行了「反體制」的抗爭活動。

最初，臺北高中的學生採取向校方，以及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陳情的方式，表達訴求。民國 35 年（1946）4 月 28 日，民報刊登臺北高中二年級學生的陳情內容：

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第二學年全體學生，為求師生一體並喚起父老及社會注意，日昨呈請該校長向省署教育處提議，俾解決該特紙情形，簡錄其要求事項如下：

1. 國文、國語、公民史地，至於畢業期誓必習熟
2. 本校情形特殊，學課內容，請照舊制高校
3. 本屆學均為舊制中學畢業生，而在於日本統治的時代，不幸受嚴重限制之失學青年、在家日修應考者年齒既長辛勞又多
4. 以卅六年八月為畢業期，應廢暑假寒假上課等、云云。⁵⁹

接著，同年 6 月底，臺北高中的 300 餘名一、二年級生，針對學制變更一事，發起大規模的「同盟休校」（罷課），對臺北高中的學生而言，這次的罷課行動「說不定是臺高開校以來的第三次罷課」。⁶⁰

根據《臺灣新生報》的報導，臺北高中學生針對學期短縮的問題，以及希望得到如大學先修班一般的待遇，而透過該校校長與教育處交涉，卻未獲得明確解答，故於 6 月 21 日，學期測驗舉辦之前，進行罷課。然而，對於學生們的要求與行動，學校卻認為這是學生為了躲避學期測驗的作為，遭到學生大力反彈。⁶¹

6 月 30 日，部分學生以「臺北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的名義，發布以日語書寫的〈臺北高級中學緊急父兄會開催謹告〉，以表明罷課的決心與目的。

⁵⁹ 〈省立台北高中二年生要求解決特殊情形〉，《民報》，1946 年 4 月 28 日，版 2。

⁶⁰ 楊益龍，〈臺北高級中學緊急父兄會開催謹告〉（臺北：台北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1946），頁 2。關於臺北高中罷課事件，詳請參閱賴冠奴，〈戰後初期的學制變更問題—以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與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為例〉，《史穗》11（2020 年 7 月），頁 47-73。

⁶¹ 〈高中罷校〉，《臺灣新生報》，1946 年 7 月 1 日，版 4。

公告中，首先說明臺北高中的特殊性，強調入學考試競爭的激烈，以及校內擁有高於全島標準的師資、設備以及學風，呈現臺北高中不僅在形式上承繼了過去「全島欣羨的高等學校」，校內的學生依然相當優秀，至今仍足以被稱為成功進入「天下的難關」之「被選上的人」。而這樣特殊、優秀的學生，只是因為名稱的改變，就遭受痛苦的命運、矛盾的待遇，是非常殘酷且不公平的。

文末，提出學生要求討論的三件會議事項：

第一件——學校存亡的問題。伴隨特殊性的表面化、師範學院的設立而來，本校的校舍維護以及存亡問題。

第二件——針對進級問題的妥當性，討論在三年級畢業並升學大學後，所產生的空位應如何處理。讓我們作為三十四年度第二學期編入生升上高年級一事，已經取得校長的同意。與教育處長仍在交涉中，且可能性很大。

（附）若此問題成功解決，我們幾乎都能獲得升學大學的保證，不需要事先進入僅有名聲，而內容淺薄的先修班。

第三件——學校內部的改革。職員的肅正。其他。⁶²

結果，第二件「進級問題」獲得校方與教育處的正面回應，學生的要求被接受後，旋即中止罷課。不過，應特別注意的是，「升學大學的保證」問題，在後續的報導以及校友的經歷中，似乎未得到解決，臺北高中的畢業生們，仍需要透過考試才能升學，並未恢復如臺北高校一般的「大學預科」性質。但是，在整起罷課事件中，臺北高中仍然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

事實上，民國 34 年（1945）底至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前，教育制度轉換、人事任用不當、教學品質不佳，以及各式各樣的校園問題，促成學潮的遍地開花，而臺北高中針對中學學制調整，所發起的抗爭，獲得教育處的特別關注，也因此率先其他中學獲得成功。原因可能是因為，第一屆臺北高中生成功獲得直升大學的權利，使得臺北高中在校生特別不滿；也可能是因為臺北高中曾為全島唯一一所舊制高校的光環，至今仍然有其影響力；又或者臺北高中在當時，仍為入學門檻較高的學校，能夠順利考取的學生，多出於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其父兄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等等，確切理由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不過，在全島各級學校同時發起爭取升級的學潮之時，臺北高中率先拔得頭籌，仍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⁶² 楊益龍，〈臺北高級中學緊急父兄會開催謹告〉，頁 2。

然而，不久之後，師範學院在同校地內的創設，限縮了自由自治的領域，伴隨二二八事件而來的白色恐怖，則扼殺了自由自治的精神。在臺北高中學生的心目中，儘管同樣是通過「天下的難關」而入學者，臺北高校生得以自稱「被選上的人」，⁶³ 相較之下，臺北高中生在劇變的時代之中，深感時不我與。

四、臺北高中的消失

民國 35 年 (1946) 初，為解決戰後初期嚴峻的中等學校師資缺乏問題，政府認為除了臨時設法向中國進行教師募集外，應主動從事中等學校師資的培養，故擬籌設「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於民國 35 年 (1946) 6 月，正式設立。

師範學院設立地點以臺北高中為基礎，共用同一校舍、校具與設備，⁶⁴ 不同於同校地的臺北高中，師範學院被歸類為「高等教育機關」，從此形成中等與高等教育共用一地的「一校地兩學校」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師範學院創立之初，乃決議「以省立台北高級中學為基礎，將來即以此基礎擴充，省立台北高級中學應另覓校舍遷讓」，⁶⁵ 而並非使臺北高中停辦、廢校。

有限的設備及校地，需供兩個不同學校的學生共同使用，民國 35 年 (1946) 9 月開學後，同校地不僅要容納 4 百餘位臺北高中學生，⁶⁶ 更要加入 518 位師範學院的新生，⁶⁷ 人數與班級數皆超越日治時期臺北高校可容納的上限。除了硬體設備外，教育處遴聘李季谷 (1895-1968)⁶⁸ 兼掌師範學院及臺北高中，在向省內外招募教員之外，更允許兩校教職員相互支援、兼職。

如此「一校地兩學校」的奇異情形，最終殃及臺北高中的存續。民國 36 年 (1947) 的二二八事件中，臺北高中因學寮關閉，學生大多返鄉避難，而未積極參與，⁶⁹ 但是，師範學院的數位外省籍職員因此負傷，兩校共用的校舍與財產，

⁶³ 同註 62，頁 1。

⁶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臺北：臺灣師大，1985)，頁 1-2。

⁶⁵ 同上註。

⁶⁶ 〈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 三十四年度第二學期在學生名冊(張任移交)〉，《臺北高校／臺北高中移交師大檔案》，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無檔號。

⁶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頁 5-6。

⁶⁸ 李季谷，浙江紹興人，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英國劍橋大學研究院，抵臺前，曾於數所大學擔任講師及教授，學經歷頗豐。

⁶⁹ 蔡錦堂訪問，賴冠姝記錄，賴文傑口述，2019 年 4 月 11 日。

亦損傷慘重。⁷⁰ 事件發生後，師範學院曾行文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希望可以全面接管臺北高中的所有校產、設備，但未被批准。⁷¹

民國 38 年（1949）4 月，起於臺大與師院學生腳踏車雙載事件，最終演變為大規模學潮的「四六事件」，使得政府於 5 月，派遣具有豐富的政治、黨務，以及訓育工作經驗的劉真（1913-2012），⁷² 前來接任師範學院院長職務，並兼任臺北高中校長。劉真對學風進行徹底的改革，以軍事管理模式實施生活訓練，嚴格控管學生的生活習慣、思想言論，使得臺北高中乃至師範學院的自由學風，消失殆盡。此外，劉真接任後，旋即以「一所本來規模不大的校舍，容納了兩個學校，當然顯得異常的擁擠」，⁷³ 向省政府呈准將臺北高中於當年結束，以便師院能全部利用校舍，並獲得批准。

民國 38 年（1949）7 月，伴隨最後一屆學生的畢業，臺北高中奉教育廳令停辦，校地、校產及設備，由師範學院接管；⁷⁴ 臺北高中相關文卷表冊，由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原省立臺北和平中學，於民國 36 年〔1947〕8 月 1 日更名）接收保管；職員由師範學院聘用，教員則由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擇優聘用，無法聘用者照章資遣。

其中，交由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接收保管的臺北高中相關文卷表冊，卻在民國 39 年（1950）4 月，以「毫無保存價值」為理由，向教育處函請銷燬。⁷⁵ 至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師大附中所藏，臺北高校與臺北高中的相關文獻因此相對稀少、零散，使得校史的研究與重建，困難重重，臺北高校與臺北高中就此殞落於時代的洪流，也自臺灣人的記憶之中銷聲匿跡。

⁷⁰ 歐素瑛，李文玉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七）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北成功中學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頁 4、234。

⁷¹ 〈為擬將台北高級中學所有校產校具移歸本院接管藉便整頓而利移交敬乞鑒核備案由〉，《師大檔案》，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檔號 0360000769A-01。

⁷² 劉真，安徽鳳臺人，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曾任中央訓練團主任秘書、南京立法院立法委員等職。

⁷³ 司琦編，《劉真先生文集》第三冊，頁 1212-1213。

⁷⁴ 《臺北高校／臺北高中移交師大檔案》，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檔號 0380000686A-01 至 0380000686A-02。

⁷⁵ 《臺北高校／臺北高中移交師大檔案》，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檔號 0390000481A-02。

五、結論

臺北高中僅於歷史上存在的短短五年時間，正面臨了新舊政權的交接之際，最為動盪不安的時代，臺北高中的學生們，仍懷抱著對於日治時期舊制臺北高校的憧憬，但僅僅一年之差，隨著新政權而來的新學制，卻剝奪了既有的直升大學權益，在求學歷程中，更因為師資缺乏、語言轉換，使得學習品質下降。戰後初期原本仍享有臺北高校「自由自治」的校風，但在二二八事件、四六事件爆發後，政府對於社會與校園的管控，日益增強，抹滅了高中生們的「高校生」認同與憧憬，更使臺北高中就此走入歷史。

臺北高中在同時期的中等學校之中，具有獨一無二特色。其原因在於臺北高中的前身，原為全臺唯一的舊制臺北高校，縱使戰後面臨時代、政權的轉換，臺北高校培育菁英的形象，仍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當時的臺灣人心目中，並將之投射於已經改制的臺北高中，然而臺北高中在戰後已與一般地方高中無異的事實，卻使得臺北高中成為全臺中等學校之中，改變最大，衝擊最為劇烈者。臺北高中「時不我與」的失落與惆悵，以及悲劇性的結局，足以作為戰後初期中等學校，受到時代轉變影響最顯著的代表。

即使時代是如此地殘苛，臺北高中仍然培育出為數眾多的社會菁英，知名校友包含曾任內政部長、臺北市長等職的張豐緒（1928-2014）；曾任新竹縣長的林保仁（1926-？）；曾任臺灣省議會議員、立法委員的邱仕豐（1930-）；曾任立法委員、多所中學校長的溫興春（1926-2012）；曾任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系主任、農學院院長的蘇遠志（1929-2021）；曾任李登輝前總統醫療小組召集人，臺大醫科名譽教授連文彬等等。

儘管生於新舊時代夾縫之間的臺北高中生們，面臨學制、語言、政治環境等種種的劇烈變動，未來的升學與就職之路，更是艱辛且崎嶇，不過臺北高中的學生們並未向悲劇的命運低頭，仍在社會上各式各樣的領域中，發光發熱。



圖八 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校友聚餐會合照（1967年）

資料來源：蘇遠志先生提供。

引用書目

《民報》

《臺灣新生報》

《臺北高校／臺北高中移交師大檔案》，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

加藤春城

1939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

司琦編

1990 《劉真先生文集》第三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何容、齊鐵恨、王炬

1948 《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臺灣書店。

吳文星

2001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四六事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李東華

2014 《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周婉窈

1995 〈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6（2）：113-161。

林安邦總編輯

20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六十週年校慶特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政儒著；柯皓仁、張素玟主編

2016 《另一種凝視：師大七十》。臺北：師大出版中心。

洪瑞重

1997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教育的接收與推展（1945-194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紹綱

2017 〈臺北高等學校學徒兵的徵召與實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聖凱

199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特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08 〈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 《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編

- 2014 〈臺北高等學校到臺北高級中學的重整延續與斷裂(1945-1949)〉,收於蔡錦堂主編,《「臺北高等學校創立 90 週年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

- 1946 年 《臺北高級中學第一屆紀念節秩序單》。臺北:臺北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

- 1946 年 《臺北高級中學概況》。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組藏

- 出版年不詳 《省立臺北高中畢業生成績》。臺北:臺北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編

- 198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編

- 198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慶祝四十年校慶紀念畫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章子惠編

- 1947 《臺灣時人誌 第一集》。臺北:國光出版社。

許雪姬

- 1991 〈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4):155-184。

陳秀鳳

- 201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陳惠珠

- 2005 〈戰後臺灣中等師資之搖籃—臺灣省立師範學院(1946-1955)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楊益龍

- 1946 年 〈臺北高級中學緊急父兄會開催謹告〉。臺北:台北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

溫理仁

- 2015 《我輩は犬である》。作者自印。

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校友會

- 1988 《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校友通訊錄》。臺北: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校友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

- 1946 《臺灣一年來之教育》。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

- 1946 《臺灣省教育概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

- 1976 《臺灣省政府向省議會施政報告 教育部門報告彙編》。臺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歐素瑛

- 2002 〈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 (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2：210-244。
- 2010 〈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兼論臺灣高等教育的復員〉，《臺灣文獻》61 (3)：287-329。

歐素瑛，李文玉編

- 2002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七) 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北成功中學檔案》。臺北：國史館。

蔡盛琦

- 2011 〈戰後初期學國語熱潮與國語讀本〉，《國家圖書館館刊》100 (2)：60-98。

蔡錦堂、津田勤子訪問，田中美帆記錄，伊藤圭典口述，2018年8月21日。

蔡錦堂訪問，賴冠奴記錄，陳宗仁口述，2018年9月16日。

蔡錦堂訪問，賴冠奴記錄，溫理仁口述，2019年3月7日。

蔡錦堂訪問，賴冠奴記錄，蕭柳青口述，2019年3月21日。

蔡錦堂訪問，賴冠奴記錄，賴文傑口述，2019年4月11日。

蔡錦堂訪問，賴冠奴記錄，蘇遠志口述，2019年4月13日。

蕉葉會

- 2004 《蕉葉會名簿 (2005~2009年版)》，東京：蕉葉會。

賴冠奴

- 2020 〈新舊政權夾縫中的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 (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20 〈戰後初期的學制變更問題—以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與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為例〉，《史穗》11：47-73。

薛月順

- 1996 《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臺北：國史館。

Research of Taiwan Provincial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1945-1949

Kuan-Wen Lai

Abstract

Taiwan Provincial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is the successor of Taihoku Higher School which was the only “old system higher school” established in 1922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feature of “old system higher school” was that in principle higher school students were able to enter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with exam-free admission. Additionally, this school was superior in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and equipped with an unique atmosphere of “liberty and autonomy”. Last but not least, the alumni of this school had mostly become leaders in different fields of expertise in the society of both Japan and Taiwan.

After the wa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ok over Taiwan and introduced a new education system which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Japanese system. Taihoku Higher School had transformed into Taiwan Provincial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In November, 1945, and shared the campus with Taiwan Provincial Teachers College since June, 1946. However,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was closed down in July, 1949 and merged with Provincial Teachers College. As the possession of the campus and all the property were taken by Provincial Teachers College, Taiwanese people’s memory of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faded away.

Due to the transition of the old and new regimes and new education system, language and culture brought by new regime, the destiny of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had changed. The thesis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olition of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The education system, curriculum and atmosphere of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would be discussed. Furthermore, how the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n system, language and culture caused by new regime affected its students in school would also be demonstrated.

Keywords: Taiwan Provincial Taipei Senior High School, Taihoku Higher School, Taiwan Provincial Teachers College, Secondary education

